

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管理的历史逻辑、 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

张朝霞

摘 要：在中国艺术管理高等教育与时俱进的实践中，初创期的“拿来主义”“经验主义”和“工具主义”知识生产模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事业发展的需求。因此，必须立足“中国实践”，总结“中国经验”，以建构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管理特有的话语体系。首先，要从历史的角度，梳理民族文化发展中源远流长的文治传统，并对百年来中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独特文化治理经验进行挖掘、凝练。其次，还要依托“人民至上”的“文化代理”原则与方法，总结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的经验，提炼基于国家文化治理目标的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管理的知识谱系。最后，更要结合当下的重大实践命题，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管理的实践逻辑，以期通过文化政策和艺术管理的升级迭代助力进行艺术的“中国之治”。

关 键 词：文治传统；人民至上；文化治理；艺术管理

中图分类号：J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840X (2024) 02-0026-09

作者简介：张朝霞，北京舞蹈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北京 100081

doi:10.14003/j.cnki.mzsyj.2024.02.03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带动了文化产业的第一波大规模发展。在表演艺术领域中，市场化趋势催生了“炒更”等新型演艺经纪形式，政策工具的逐步完善更是从根本上推动了艺术生产与消费的结构化转型。为满足社会需求，多所艺术院校开始尝试在相关专业目录下进行专业化艺术管理人才的系统培养。2002 年左右，国内艺术教育界开始连续招收管理类本科生，并尝试探索依托艺术史论、经营管理、营销传播等知识模块进行课程设计。

初创期的中国艺术管理高等教育秉承借鉴、融合、创新的原则，在知识迁移基础上完成了应用性艺术管理知识框架的建构。余丁等人的《向艺术致敬：中美视觉艺术管理》、张朝霞等人的《演出经营与管理》等

著述本着向境外学习、向行业学习的初心，开始了门类艺术主导型艺术管理知识的尝试性书写。田川流、郑新文、余丁、谢大京、董峰等人不同体例的概论类艺术管理著述正式出版，标志着中国艺术管理教育知识谱系系统化建构的开始。其中，郑新文主编的《艺术管理概论：香港地区与内地经验及国内外案例》（修订版）在国际非营利艺术组织管理工作系统知识基础上，整合了国内政策法规和行业实践案例等应用性内容，被多所高校认定为艺术管理本科教育的基础型教材。

在学术共同体建设方面，中国艺术管理教育学会和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艺术管理专业委员会比较有代表性。前者依托国内艺术教育领域的单科艺术院校和综合性大学艺术管理专业，以年会轮值方式组织专题性研讨和大学生项目策划大赛，该赛事已运行 18 届；后者以综合性艺术院校为依托，整合了单科艺术院校和综合性大学艺术学系科，同样以年会轮值方式推动艺术管理学研讨，该

收稿日期：2024-03-06

研讨论坛已运行 11 届。这两个学术组织在会员组成上有交叉,但其年度议题设置有明显差异,二者共同促进了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艺术管理教育学术共同体的成长。

在中国艺术管理教育学会早期学术积累基础上,上海戏剧学院主持开办了国内第一本专业类学术期刊《艺术管理》。同时,以中央美术学院和上海戏剧学院为先行院校,中国艺术管理教育获批特设艺术管理本科专业。至此,中国艺术管理教育在统一专业目录下开始了系统的升级迭代。

进入新时代以来,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洪流中,中国艺术管理学界开始逐步意识到,必须超越初创期的“拿来主义”“经验主义”和“工具主义”策略,尽快建立稳定的基于本土经验的专业自信、学科认同和学术自觉。2023 年 11 月,中国艺术管理教育学会在北京舞蹈学院召开了第 18 届年会,会议以“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管理的新思维、新路径和新方法”为核心议题,设置了主论坛、硕博论坛和产教融合高峰论坛等特色模块,并以“艺术+N”为题设置了“艺术+”主赛道和“数字中国”“城市更新”和“乡村振兴”三大分赛道,以课题指南形式明确策划案的选题方向,以引导广大艺术管理师生关注“国之大者”、聚焦时代需求。从某种意义上讲,此次会议是中国艺术管理本科教育“20 年后再出发”的一次集体动员,体现了各个艺术院校和各个学术共同体大体一致的努力目标,即:立足“中国实践”、凝练“中国经验”,为国际艺术管理教育界贡献“中国力量”。可以说,构建中国特色艺术管理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已经成为亟待中国艺术管理学人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事实上,作为文化发展中一种结构功能式的实践类型,艺术管理类工作古已有之,而且在与其外部环境和内部要素不断交互迭代的历史进程中,不同文化生命体内的艺术管理类工作形成了共性和个性并存的实践范式。其中,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管理实践范式的形塑与发展带有明显的民族化特性。本文将从中国文化治理传统

等历史维度入手,采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两个结合”的原理与方法,探索建构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管理知识谱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

二、基于中华文明连续性发展历史逻辑的“文治传统”

将文化艺术类事务视作“国之大者”,是古老中华文明得以绵延至今的历史智慧和核心方法论,而与之嵌套发展至今的“文治传统”奠定了中国式艺术管理的历史逻辑和文脉基础。《左传·成公十三年》有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①,意思是祭祀和军事是保障国家安全稳定发展的“大事”。其中,将“祭祀”等贯通人的内在情感和外在动作的仪式性活动,视为与军事同等重要的国家大事,这为类似的文化行动介入“国之大者”预留了空间,从而演变形成了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治理之道。在这里,文化可以有多种形态和方式,但在儒家文化传统确立后,“文化”的重点内容或载体就有了明确的指向性,从而构成了中国特色文化治理体系的传统肌理。

(一)“移风易俗”与中国礼乐传统的奠基与传承

在诸子百家中,儒家特别强调“制礼作乐”的重要性,并努力将其视为中国社会治理的关键要素。儒家礼教思想与礼乐实践范式由西周开始并贯穿于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了独特的中国乐教传统。这一传统,也是中国文化治理传统思维很鲜明的民族特色。在礼教制度下,乐教传统特别是中国古代的音乐制度、音乐机构或组织、音乐管理者、乐队和乐舞节目及其相应的表演场景和表演制式等等,无疑会为我们思考中国式艺术管理体系的建构,提供某种结构化的启示。

中国乐教制度奠基于周代。在分封制、井田制基础上,西周开始实行宗法制,贵族对教育资源的掌控呈现出明显的等级化倾向。周代统治者强调“礼不下庶人”,实施“吉、

^① 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861.

凶、军、宾、嘉”五大类“周礼”。为了维护其地位,西周开始推动“制礼作乐”,以全面加强其政治、文化和社会制度建设。据《乐书》载:“夫上古明王举乐者,非以娱心自乐,快意恣欲,欲将为治也。……故乐所以内辅正心而外异贵贱也;上以事宗庙,下以变化黎庶也。”^①

西周礼乐制度以乐舞教育为主要载体,形成了体系化的乐教实践模式。在这一历史时期,礼、乐、舞、射是其重要的学术内容和教学内容,不同级别的教学内容和所需器物皆有明确的规定。在具体实践中,周代实行“学在官府”,一切教育资源皆为贵族所享有和管控,民间私家“无学、无器”。其中,“乐”是西周“乐舞教育”的“主课”,分为“乐德”“乐语”和“乐舞”诸项,即: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以作动物。^②其中,“乐德”以“礼”为导向,属于政治教育,其目的是确立等级名分。

为了更好地培养未来的各级各类管理者,西周乐舞教育体制在教育层级上囊括了“家庭教育”“小学教育”和“大学教育”三个层级。为了开展有效的礼仪规则教育,西周已经开始关注到贵族子弟不同年龄段的教育要求。据《礼记》记载,这一阶段的教育,要求“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③。作为贵族道德行为规范和社会生活能力的培养方式,西周家庭教育和小学教育开始导入“六艺教育”,涉及德、行、艺、仪等方面。至大学教育阶段,西周乐舞教育的体系开始完善。一般除太子、王子、诸侯、大夫嫡子或长子外,少数极个别的平民子弟经过比较严格的推荐考核制度,也可以进入大学学习。王子入学年龄不迟于冠礼之年,即15岁,学程一般为

9年,即所谓“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学记》)大学空间设置有天子和诸侯的区别,《礼记·王制》记载:“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在这里,贵族子弟和平民中的佼佼者“学大艺、履大节”,以“礼乐”教育为核心,接受分科教育,并逐步成长为合格的未来统治者。简而言之,西周大学教育着力通过“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技能),有效地培养了未来的统治精英。

孔子在《论语·泰伯》中,对诗乐舞一体化所带来的教化功效有过明确的描述,即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也正因为,对“礼崩乐坏”的现实,孔子颇有切肤之痛。为培养有道德有文化的君主,孔子以私学为平台,创造性地继承并发展了“六艺教育”传统。在游历各国、广收门徒的实践中,孔子创立了影响深远的儒家教育思想体系,其中,礼乐教育是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以“诗”“书”“礼”“乐”为主干课程,并整理出了《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种古代文献典籍,史称“六经”。其中,“乐”是各种美育形式的整合,包括诗、歌、舞、曲等多项内容。孔子对“乐”的选择,遵从“善”的标准,即所谓的“尽善尽美”。在儒家看来,通过有效的礼乐教育,人借助“礼乐同和”,可以达到“仁”的最高境界。这一时期的舞蹈平和舒缓、稳健持重,呼应着端庄高雅、流畅饱满的人格形象,这种内外兼修的乐舞教育方式极大地发挥了艺术的功能性价值。在这里,乐舞教育与礼教是同构的。根据“乐”的道德标准,孔子赞扬古代的韶乐,而反对通俗的“郑声”。作为教师,他能够弹奏乐器也会歌唱,更善于欣赏和评价。同时,他还强调有教无类,72位著名弟子精通六艺、各有所长。就这样,在儒家身体力行地推动下,自汉代开始,“礼乐相和”的乐教传统得以确立。尽管在后来的演变中,诗、乐、舞成了独立艺术门类,从“乐舞”中分离出来,但

① 司马迁. 乐书 [M] // 司马迁. 史记.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1236.

② 郑玄. 周礼注 [M]. 石臧, 整理.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3: 239-240.

③ 礼记: 上 [M]. 胡平生, 张萌, 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7: 556.

“以文化人”“以艺促治”的独创性文治思想和具体实践,在与不同时期的中国社会互动进程中形成其结构性传承与迭代的内在逻辑。

作为这一结构性传承与迭代的基本实践范式,“六艺教育”内容丰富,涉及从“小学”到“大学”等不同层级。其中,礼乐教育为“六艺教育”的核心,强调将重大社会生活的“礼”与“乐”密切结合在一起,凡行礼必有乐。总括来讲,在比较典型的中国传统社会中“礼”的范式,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和嘉礼等“五礼”都要与不同的仪式相配合,并需要有相应的仪容训练。而“乐”则包含了“诗乐舞”“田猎娱”等不同类型的活动。其中,涵养社会精英阶层的贵族气质和品行的“乐德”“乐语”和“乐舞”有“内”“外”之分。其中,“乐”主修“内”,“礼”主修“外”,而个人修养的最高成就则是内外兼修。中国传统社会精英阶层在礼乐教育体制中习得的礼乐技术和品德修养,在后续迭代中逐步成为稳定和巩固社会秩序的重要抓手。换言之,中华文明之所以绵延有效,兼具个人修养、社会秩序和审美教育功能的可迭代的礼乐体制在其中具有一定的功能性作用。

基于“以文化人”的逻辑“没有整体化逻辑这一说”,人们所习得的“乐舞”等艺术的技能与修养,是实现“移风易俗”乐教目标必备的。就这样,以“乐舞”为载体,经过“兴道讽颂”等“乐语”的中介,人们最终获得“中和孝友”兼备的“乐德”,于是,以“六艺教育”为乐教机制的类艺术管理实践便取得了实质性成果。在这样的教育理念和实践逻辑之下,古代乐教功能的发挥使中国式艺术管理有了较好的参照系。“乐教”由内而外,与“礼教”互为表里,从而最终在社会层面上完成了国家“善治”目标的“基础工程”。

据《孝经》,孔子曾经详细指明这一文化教育机制的运作逻辑——“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①这里的“乐”其实还是指“乐舞”等综合性艺术,包含内外兼修的身体训练在内。对崇尚礼乐

教育功能价值的中国乐教传统而言,书、数的教育一般被称为“小艺”,位于“六艺教育”的尾端,而礼乐等“大艺”则因其蕴含的功能性教育价值而位于优先排序的前端。

随着社会的发展、朝代的更迭,“六艺教育”也逐步走向了结构性调整,重德、尚文的新风尚开始形成并逐渐成为主流。换言之,自周公制礼作乐以来,这种以崇德尚文为标志的礼乐传统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并最终形塑了独具中国特色的自由、秩序与和谐并重的文化模式。尽管不同历史阶段的文治内容会有差异,但其“乐教”“诗教”“文教”等文治逻辑没有变,而且通过艺术文化提升社会凝聚力、强化权力秩序的实践策略也将在历史维度上不断更新。更为重要的是,“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文治思想和治理逻辑,客观上将“文学艺术”与“国之大事”勾连在了一起,最终形塑了中国式文化治理的历史逻辑。

(二)“以文化人”与中国传统社会文治机构的体制化运作

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治理实践,早在远古时期就已经开始有所尝试。舜的文官体制设计是早期同类实践范式的代表之一。舜设立“司徒”“秩宗”和“典乐”等三名文官,分别负责“五常”“三礼”和“乐教”。其中,“乐教”除了要培养诗歌和乐舞技能外,更强调通过乐教活动来培养人的品行、沟通部落成员的情感,以达成其政治目的。与之相关联,这一时期所谓“学校样式”的设置,也具有明显的乐教色彩。“成均”和“庠”是原始社会末期最常见的两种“学校样式”。其中,“成均”在郑玄《礼记》的解读中被描述为“均者,调也”,而在实践中,“成均”由乐师来负责管理一应事物,其场所就是乐师演奏歌唱之处。设立“成均”,不仅要求部落显贵提升音乐修养,而且也为其子弟实施乐教。所以,作为古代学校的萌芽形态,进入“成均”的“教者”与“学者”都要从日常劳作中独立出来,进行专门的乐教活动。

其后,商代的教育体制更趋完备,除了“大学”“小学”外,还专设了“右学”和

^① 汪受宽. 孝经译注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60.

“瞽宗”。其中,瞽宗属于“大学”性质,以“乐教”为主。换言之,瞽宗是当时专门用以培养贵族子弟的礼乐教习学校。商代的“序”则继承了“射”的教习旧历,并在保持军事体育训练内容外,扩充了有关礼乐教育的内容。按照商代习俗,贵族子弟必须要在接受了礼乐教育之后,才被允许参与祭祀等重要社会文化生活仪式。可以说,“以乐造士”已成为那时最重要的乐教机制之一。

自汉代以来,国人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身心修炼理念指导下,逐步找到了“读经入仕”这一上升路径。儒家力主推行的乐教制度虽经破坏渐趋式微,但其倡导和确立的艺术教育传统却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保存”下来。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学校制度变革,隋唐教育取得长足发展,初步形成了臻于完善的封建时代国家教育制度。除兼用儒、释、道思想之外,隋唐国家重要的文教制度的内容还包括推行科举制度、鼓励私人办学等。国子监从太常寺独立出来,首次设立国家级教育行政机构,并进行管理。中央官学系统形成了国子监主管的专设学校和各政府部门主管的附设学校两个子系统。其中,在政府各部门附设学校的专门化人才体系中设立了专门的乐舞学,其位于太乐署之下。汉代宫廷乐舞机构包括“太乐”和“乐府”这两种乐舞机构,负责主持民间乐舞的采风与整理,这在客观上对汉代乐舞的发展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

到了唐代,国家级别的乐舞机构分裂为三。第一为太常寺。太常寺的设置是出于对祭祀祖先的重视,而祭祀祖先是儒家正统忠孝仁义思想的重要体现,上行下效,从宫廷到民间都有相应的仪式化规程。太常寺作为常设机构主要负责乐舞等繁琐而又庄严的礼仪仪式管理。太常寺的乐舞主要用于祭祀先祖和上天,强调庄严肃穆的仪式感,非享乐或单纯感受之用。而非仪式乐舞的管理则另设教坊来负责,其核心功能是满足统治者的文化需求。当时,唐玄宗提出,“太常礼乐之司,不应典倡优杂伎”,倡优、杂技表演者等非仪式化表演工作者,需要单独设置一个专门机构,来排练俗乐、散乐和百戏。

自唐一代,梨园的建立,教坊的设置,

满足了区分雅乐和俗乐的需要,并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统治者对歌舞娱乐的个体需要。唐朝宫廷中的俗乐、百戏、胡乐、胡舞发展迅猛,蓬勃兴盛,规模逐渐扩大,原有的太常寺本来是礼乐机构,在当时已无法适应俗乐的发展态势,更无法满足统治者日益增长的享乐需要,于是俗乐便从太常寺独立出来进入教坊。从太常寺到教坊的创立,再到梨园的诞生,既与雅乐和俗乐的分离相关,也是统治者个人对享乐需求的驱动所致。教坊面对的是整个宫廷和皇亲贵族,梨园则是皇家私人音乐机构。太常寺中的乐人主要出现在祭祀音乐中,其所需音乐素养不高,而教坊中乐人官职的品级与官职的分工都更为繁复。在实际运营中,教坊乐人按照地位身份与舞技程度被划分为四个等级,梨园中的乐舞艺人则是全国各地优选而来的。梨园子弟身份地位相较太常寺和教坊乐人的身份地位更高,其乐舞技艺也更优秀。乐舞服务于政治与皇室贵族,而统治阶级的享乐需求和审美偏好也推动了乐舞教育的多层次发展。梨园、教坊等教育管理机构的发展,国家主导的采风机制也为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与发展提供了新的保障、新的机会。

宋代在沿袭唐代的太常雅乐与教坊等乐舞机构运营方面,由于宫廷艺人被遣散回民间,以及宋代城市化市场经济的兴起,乐舞传统式微,各种民间舞蹈与民间娱乐表演开始发展起来。元、明、清的表演艺术重新演变为综合形态,从元杂剧流行到清代戏曲繁荣,舞蹈融入综合性表演艺术中作为其重要表现部分继续发展。清末启蒙思想开始兴起,历代王朝承袭的乐舞管理体制式微,太常寺被废除。同时,随着戏曲的繁荣,国家层面的乐教传统被更通俗、更普及的“高台教化”实践模式所取代。

要言之,在文化治理层面,特别是在文官体制和管理实操领域,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文治方略在内容和手段不断迭代中,走入近现代整体性变革阶段。与此同时,中华文明的延续性、开放性和创新性特质,决定了中国式文治实践范式必然会在不同的历史起点上完成自身的“基因重组”,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进入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的新时代。

三、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文治原则与艺术管理实践

近代中国在外国列强坚船利炮的打击下,开始进行现代国家建设的多方位积极探索。为建设一个国富民强的现代化中国,一代代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和艺术家开始了包括“乡村建设运动”“教育救国运动”等社会文化实验。他们试图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探索,找到“经济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的平衡点。但这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摸索过程,很多实验在实践层面并未取得预期成果。因此,需要有一个文化代理人或者一种代理机制,来主动担责并有效地推动意识形态等非稳定文化模式向传统和常识性等稳定文化模式转型。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及其在推动中华民族逐步走向繁荣富强过程中所做的卓越的历史性努力,使其客观上成了中国式现代化文治实践的“文化代理人”。

基于全新的治理思想和实践逻辑,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创造出新型国家文化治理理念与手段。其中,“人民性”原则就是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治理智慧在新的历史起点得以超越性再造的逻辑支点。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强调的,共产党的宗旨就是要“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为“整个无产阶级”而奋斗,要求每个共产党人除此之外都“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为充分发挥不同阶段文化艺术的社会功能,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人民性”原则。遵循人民至上的原则,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站在大多数人的立场上,创造性地引导广大艺术家“为人民而艺术”,确立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治理思想和艺术生产逻辑。在这里,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原理创造性地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结合了起来,妥善处理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为人民而艺术”的文化治理原则和“如何为人民”的艺术管理实践方法。基于人民原则和“以文化人”的实践机制,将具有社会共识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通过稳定的渠道和有效的方法,使之内化为人的自我修养和生活习惯,这构成

了以文艺辅助现代中国进行善治的基本逻辑。

在百余年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文化代理者”,不断对古今中外的重要文化治理实践议题进行反复摸索和实践矫正。从延安时期开始的新中国文化建设样本的“创造”,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开启,从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调整,到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国家建设治理体系的创造性构建,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共产党终于找到了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建设和治理的制胜法宝。

以此为圭臬,探讨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管理事业的发展理念、路径和方法,无疑是因应时代变化的必然选择。这是中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治理智慧在与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现代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理论产物,也是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这一特殊文化代理机制的实践成果。本着人民至上的原则,实时调整国家文化发展策略和政策,不断修订完善文化体制机制,在具体的艺术管理实践中,以高水平的“中国之制”通达高质量的“中国之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种种文化方面的制度和改革措施都是为人民而制定的,中间虽然也有重大顿挫和调整,但基于人民性原则的初心,久久为功的工作方式也逐步取得了应有的成果。从国家宏观政策的落实,到不同层级政策的实施与调整,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管理形成了独特的效率提升机制和效益创造模式。

(一) 中国式现代化国家建设中的文治策略与工作路径

为筹建一个全新的现代国家,中国共产党早在延安时期就开始了中国式现代化文治实践的积极探索。特别是,围绕文化自身的发展以及文化在整体建设中的功能作用,中国共产党引导延安文艺工作者进行了大胆的实验和探索。其中,“文艺为什么人”等基本问题的探讨具有奠基作用。在民族危亡关头,中国共产党决定以文艺作为社会动员工具,积极摸索“为人民”的艺术发展之路和艺术管理之道。

1942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由毛泽东等人召集百余人召开了一次关于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座谈会。会上,毛泽东先后发表了两次重要讲话,阐述了文艺工作者的立场、

态度和工作方法等问题,并将“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这两个问题设定为文艺工作的核心议题。其中,关于中西、古今、普及与提高等艺术生产与传播的症结问题也得到了充分讨论,很多思考问题的角度和解决问题的方向,对我们今天思考艺术管理理论与对策问题依然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从整体上看,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站在重要的历史关头,为完成社会动员、战胜敌人而发挥文艺的结构功能主义作用所做出的重大理论判断。

在这一理论逻辑之下,传统社会中“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文治思想产生了质的变化。通过适配的文艺创作、生产与传播,切实做到“移风易俗”,让更多的人民群众参与到战胜敌人、建设一个新国家的时代洪流中来。在延安文艺发展过程中,民族歌剧、秧歌剧等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原创性现代民族艺术取得了丰硕的艺术成果,群众喜闻乐见的现实主义文艺成为当时文艺创作的主要方式,艺术整体上完成了与当时社会环境良性交互的艺术生态重构。

这一时期,不仅产生了有广泛影响力的艺术作品和艺术家,而且还创建了第一个党领导文艺工作的学术共同体。1938年2月,《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签发,以纪念鲁迅先生为名,正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培养文艺干部的政治立场和理论定位,对未来的文艺领导者提出了远大理想、斗争经验和艺术技巧兼备的目标要求。从某种意义上,鲁迅艺术学院的建立与发展,成为中共文艺政策研究和文化管理人才培养的“文化生命体”,其在发展过程中不但成功培养了大批艺术家和艺术管理工作,而且为共襄国是、建设一个新的国家进行了理论奠基。

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了新时代文艺工作座谈会。这次会议从某种意义上是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跨时代呼应。这次会议着重强调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就是“人民的文艺”,既有“为人民而艺术”的宗旨定位,也有“如何为人民”的方法设定。在具体工作方法上,习近平强调文艺要“以人民为本位”,从创作导向、表现主体、鉴赏主体和服务对象都要以人民为中心。

(二) 建构基于“人民性”本位的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管理的实践逻辑

从国家层面文化治理的底层逻辑到行业层面艺术管理的实践操作,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管理的实践范式在“人民性”原则下,经历了百余年的创新实践,始终以自己的节奏和方式演进。从历史逻辑来看,传统社会中基于儒家思想的礼乐制度和乐教实践,近现代新旧文化冲突中的艺术改良、“教育救国”实践,都为我们探索中国式现代艺术管理的内在逻辑提供了经验性参照。而自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逐步建设完善的社会主义国家文化治理体制,则为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管理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建构提供了基本依据。在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基于“人民至上论”的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管理实践为国际艺术管理学发展提供独特的“中国经验”。

1. 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组织的顶层设计要遵循“善治”原则

自十八大以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逐步成为关注的焦点。对艺术组织而言,现代化治理理念和治理方法的导入主要体现在“向内”和“向外”两个面向上,并在“为人民而艺术”的实践逻辑下凝聚成一体。

首先,在“向内”方面,艺术组织要着力从“人”的维度入手,落实“人民性”这一艺术组织内容生产的价值导向原则。具体而言,优秀的艺术组织需要贯通“国家文化战略”“组织顶层设计”和“个体价值追求”等顶层设计的共构原则,在国家文化治理的大框架下营造组织内部的良好艺术生态,并对艺术家进行有组织、有规划的内容生产引导。为此,艺术组织需要研究艺术环境与生态,主动呼应政策、影响市场,以“擘画人民”“依靠人民”和“服务人民”等要义来进行顶层规划设计,以确保能通过组织创新来提升其艺术生产的整体效能。

其次,在“外向”方面,艺术组织要着力从“社会”的维度切入,落实“人民至上”的“文化民生”原则。艺术组织的发展规模和运营管理模式不尽相同,但在促进公共文化服务的高质量发展方面却有着大体一致的功能定位。从国家利益的角度看,艺术

组织肩负协同供给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的天然使命，因此，在组织架构、发展规划和运营计划等方面必须进行针对性的设计。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质性推进，城市更新、乡村振兴等时代议题也对艺术组织的社会服务意识和能力的提升提出了新的结构化要求。院团、场馆、公共教育或艺术教育部门的开设是部分艺术组织的主动因应策略，但公共性、服务性职能的系统性扩充还需要导入更清晰、更有机的组织创新设计。

不论是从文化强国目标制定的理论高度上，还是从艺术组织高质量发展的实践维度，将“为人民而艺术”作为指针和方法论，将会极大提升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管理的能量。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艺术组织与其外部环境间的能量交换，进一步优化、形塑了艺术组织的“文化生命体”。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同文化生态位的“文化生命体”与其外部环境不断进行能量、资源和信息的置换，从而客观上达到新时代文化发展语境下的善治效果。

2. 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管理人才培养的价值要素和能力构成

要培养与新时代文化发展语境适配的艺术管理专业人才，就需要科学地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和“时代之问”，在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高度上提炼“艺术管理之术”，从社会主义新文明、新文化、新文艺建设经验中汲取“艺术管理之术”。基于此，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管理人才培养的价值要素和能力构成就必须从“大艺术管理”维度上破题。

首先，就价值要素而言，“大艺术管理”维度上的人才培养就应该自觉树立“人民至上”意识，着力培养未来从业者的“文化领导力”。作为艺术管理工作者的核心能力要素，文化领导力并不限于组织化的艺术行政领导力，而更应该注重立足时代、服务人民的非职权领导力的养成。具备这种领导力的

艺术管理人才，应该洞悉文化政策的基本原理，能够主动将“艺术生产”与“国之大事”相关联。因此，在新时代，应该高度重视艺术管理人才宏观视野、价值导向和服务意识的培养。

其次，就能力构成而言，应该秉承“为人民”“为时代”的基本原则，着力提升高质量、高水平的艺术管理工作者必备的政策力、审美力和服务力等综合性能力。在具备从事本专业综合素质的基础上，有作为、有担当的艺术管理人才还应该积极投身文治实践，以实际行动支持艺术家和艺术组织，以激活个体创造性和多元艺术生态。

四、面向未来的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管理创新实践问题

在迈向2035“文化强国”建设目标的进程中，中国式现代化的艺术管理要依据“人民至上”原则，把贯通艺术教育、艺术创制、艺术消费和社会拓展的全链式艺术生产模式作为突破口，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交互的环境中，促进艺术组织再定位。通过组织愿景规划和艺术内容策划，艺术组织将逐步走向可持续发展。同时，依据“大者趋大、小者趋繁”^①的文化生态位逻辑，通过有效的政策整合，鼓励文艺“两新组织”和“两新人才”以个性化姿态主动呼应“为人民而艺术”的时代命题，以差异化、生态化艺术供给态势，匹配完成公共文化服务的协同供给。同时，在政府、社会和市场的多元外力作用下，艺术组织更应该从公共文化服务创新的角度入手，以原创性艺术产品和高品质艺术服务面向公众进行开放性艺术赋能实践。为此，需要新的历史起点上，创造性地实现艺术管理“双效合一”的发展目标。

① 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南南合作特设局高级顾问拉拉·德海因策琳（Lala Deheinzelin）于2010年11月18日出席第五届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主论坛之“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国际论坛”，在这个论坛上她发表了题为《未来机遇：创意经济的发展》的主旨演讲，描述了可持续发展理念下文化创意产业在未来会走向“两极化”的发展状态。她认为，由于产业集聚和业态融合的客观需求，“集团化”“跨业态”“大制作”会成为未来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主流趋势，即所谓“大者趋大”；而另一方面，由于很多国家和地区坚持“文化多样性”“个体创造性”等注重特色和创新的本地化政策选择，受其影响，在“大者趋大”的文化发展态势之下，以“社区（群）艺术”和“个体创意”为代表的微文化企业和艺术工作室也“逆势”而起、蓬勃发展起来，并最终形成“大者趋大、小者趋繁”的动态平衡格局。在此，本文试图借用拉拉的这一学术观念，描述在新发展理念下我国较大规模艺术组织建制制的“集体科研”式艺术研创趋势和“两新政策”激励下小微艺术组织和艺术家的个性化创作相辅相成的多层次艺术生态格局。

在具体的艺术项目管理实践中,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管理必须克服随意性、碎片化的发展逻辑,在“同源同构”“同源异构”“异源同构”等不同的方法论整合中,谋求在“延续性”基础上进行可以延伸、可以复制的现代中国文治实践。具体而言,面向未来的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管理实践进行因应时代的全方位创新。

首先,遵循艺术管理实践的“文治逻辑”,系统探索由国家统筹、政府主导的公共文化空间开放和艺术内容植入等问题。在新空间、新业态和新组织的多维创新中,贯通艺术发展与社会治理、艺术生产与现代文化消费等多重实践逻辑,将现代城乡新文治空间打造成国人共享的创意文化空间,以促进文化生命共同体的成长。

其次,立足艺术组织服务“国之大事”的使命与愿景,将艺术管理实践与现代城市文治空间的系统规划相关联。依据政府、社会和市场协同治理下的中国式现代文化治理原则,从“城市更新”“艺术乡建”“数字艺

术”等新维度入手,探索艺术组织“拆墙透绿”进行社会服务创新的新路径、新方法。

结 语

综上所述,作为一种特殊的实践方式,艺术管理已经拥有了较长的发展历史,在全球范围内也有一些共享的发展规律。但是由于每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不同,从历史上传承下来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体制也不同,不同国家的艺术管理学形成了共性与个性兼备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构模式。因此,如何结合新时代中国艺术管理学科建设的问題与对策,将集体创作法等独具特色的艺术生产管理范式纳入中国式艺术管理知识谱系建构,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探究中国式艺术管理学建构的内在机理,必将成为未来我们总结提炼中国艺术管理实践的重要任务和努力方向。

(责任编辑 王 喆)

Logics of History,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Art Management in Chinese Modernization

Zhang Zhaoxia

Abstract: In the practice of China's art management in higher education with the times, the "fetishism", "empiricism" and "instrumentalism" modes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at the initial stage are far from being able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nterprise in China.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onstruct a unique discourse system of Chinese modern art management based on "Chinese practice" and the summarization of "Chinese experience". First of all,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we should sort out the long-lasting tradition of cultural governa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culture, and excavate and study the unique experience of cultural governance accumulated in the process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ver the past century. Secondly, relying on the principle and method of "cultural agency" with "people first", we should summarize the experience of the prosperous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undertakings and cultural industries, and refine the knowledge spectrum of Chinese modern arts management based on the goal of national cultural governance. Finally,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the practical logic of art management with Chinese modernization in light of the major practical propositions in current China with a view of assisting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through the upgrading of cultural policies and art management.

Keywords: cultural tradition, people first, cultural governance, art management

About the author: Zhang Zhaoxia,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Humanities, Beijing Dance Academy, Beijing, 100081.